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1

先秦两汉卷

肖东发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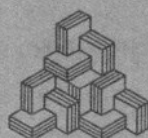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先秦两汉卷

肖东发等
著

1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 / 肖东发等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68 - 1783 - 7

I. 中… II. 肖… III. 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②出版工作—
文化史—中国—秦汉时代 IV. G23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4432 号

责任编辑 / 侯仰军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7.75 彩页 4

字 数 / 394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柳斌杰

中国出版，源远流长；中国图书，博大精深；中国典籍，为世所罕见，亦是举世公认。中国出版不仅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中国出版无愧是这一发展进程在世界东方的辉煌见证，同时也是这一发展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创造的一部分——一个值得人类骄傲、具有典型意义的部分。中国是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图书出版的历史。三千多年来，中国不仅先后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为出版业的形成与发展贡献了造纸术、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还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丰富贡献了300多万种图书，贡献了品种繁多、数量巨大的杂志、报纸、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等。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不仅改变了图书的介质形态与复制方式，也改变了人类信息的存储与传播方式，实现了长时间、远距离传播知识的梦想，使出版

逐渐成为重要的强大的信息传播手段。数量巨大的出版物的出版、流通在积累文化历史知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对象和极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二

从中国文明史来看，中国出版起到了记录历史文明和推动文明发展的双重作用。

1. 中国出版记录了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历史，形成了几千年连续不断的伟大文化成果。

中国是历史悠久而又有着丰富文明遗产的伟大国家。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历数千年没有中断而一直绵延到今天，此种文明景观之形成，是因为中国有几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有汗牛充栋的书籍出版物，它们是中国文化经过积累、筛选、整理之后存留下来的物质形态之一，是物化了的中华文化宝藏，是文化创造的伟大成果。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最明显地表现为两点：第一，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未曾发生断裂现象；第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数千年一以贯之、从未中断。历史记录和经典著作是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字反映。中国文明的连续性，集中保存在历代图书典籍的记载中。甲骨卜辞、金石铭刻的主要内容即是有关史事的表述。《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记载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马迁作《史记》，创修史范例，上起黄帝，下迄汉武，要事均列其中。自《史记》以下，历代均有断代的纪传体正史，首尾相衔，且自共和元年（前841年）始至当代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形成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历史的长河。

2. 中国出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增强了中华民

族的凝聚力。

以《史记》开其端绪的“二十四史”以及汗牛充栋、令人叹为观止的经、史、子、集等图书典籍，记载了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反映了我国从远古以至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的发展进程，在传承文明、积累文化、凝聚民族力量、巩固多民族大团结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仅就这两点来看，中国出版之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出版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发展史。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份遗产的主要载体就是书，正如《礼记·经解》说：“疏通知远，书教也。”中国出版史所蕴涵的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仍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价值，因为它有利于当前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现实的历史创造活动，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确有借鉴作用。

尽管历史已经逝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相关的记载和著述中，从历代遗留下来的巨大遗产和丰富信息中，去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去体味无数前人的社会实践和伟大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出版史可以让今天的人们把自己的视野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再从遥远的过去回到现实，投向未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大地丰富，在自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的结合上，焕发出更大的激情、智慧和勇气，在当前的历史运动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和创造力量。

中国出版承载了太多的优秀历史传统，其中以改革进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识、重视文化积累三方面尤为重要，它们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仍具有活力。中国出版史之所以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始终会以鲜活的历史激发今人和后人的不尽的思考，让我们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顺应时势，把握机遇，创造崭新业绩，推动历史进步。

——中国出版史所记录的众多人物的言行，向后人提供了“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1】}的标尺。

——中国出版史所总结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为后人提供了启迪心智、增长智慧的源泉。

——中国出版史所描述的种种制度模式和思想模式，给后人提供了现实选择的历史参考。

在这方面，中国出版史实在是一座巨大的精神宝藏。

四

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中国出版史就是出版行业的教科书。中国是出版的泱泱大国，需要总结丰富复杂的中国出版历史实践活动，以从中寻找发展规律，为当代出版事业提供借鉴。中国以往的出版历史，正是现今中国出版的起点。出版业自身的发展，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过程，只有在批判继承中才能创新，才能进步。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21世纪，批判地借鉴西方出版业的积极成果，固然是发展中国出版的重要条件；而批判地继承中国出版的优秀遗产，更是发展当代中国出版事业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国出版的历史表明：出版业的发展，一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之需要，一则取决于时代提供的技术条件，一则取决于对以往出版经验的继承。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中国的出版事业起源早，成果多，在编辑思想、编辑方

【1】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法、出版技术、发行方式、组织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长期的出版活动中，还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编辑家、出版家、经营家和技术专家，他们为民族进步、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总结中国出版史上的这些宝贵经验，探寻出版事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规律，无疑将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科学的依据。

出版业过去的发展历程，正是未来出版业发展的基石。这就是面向过去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对于今日中国出版之价值所在。

五

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出版史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属于专题史，它以中国历代出版活动及出版人物为研究对象，充分运用文献典籍、考古发现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钩沉稽玄，探幽发微，考镜源流，传承文明，力求翔实而又清晰地展现中国出版滥觞、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它不仅对于当前的出版事业有借鉴意义，而且在加深和拓展“中国通史”等领域的研究和阐述方面，也起着其他论著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出版史也是出版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关于出版发展过程的学问。学科的主体包括对历代出版成就的展示、对出版历史的疏理、对出版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出版历史规律的探讨。研究中国出版史，“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对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推动我国当代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出版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建设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出版史又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事实上，中国的文化主要是靠书刊保存、流传下来的。中国出

版通史的酝酿、探讨、研究，离不开全部的文化背景，而文化史的研究也离不开中国出版史研究，离不开历代留存下来的丰富图籍。中国出版史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史的基础学科。把中国出版与整个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科学的。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出版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版史，充分重视少数民族出版史的研究，从搜集史料入手，展示各民族的出版成就，反映少数民族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的特殊作用，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出版史研究开展得较早，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一直不够系统，并且往往处于分散的状态，没有形成合力，有分量的出版史研究著作不多见。改革开放给中国出版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出版通史》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和“十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历经8年编撰完成，即将出版，填补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我相信《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必将对我国出版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以及印刷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出版史学学科建设也是一个实际的推动。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编辑家、出版家，创造出了数不胜数、承载积累、传承文明重任的优秀出版物，在编辑思想、编辑方法、出版技术、发行方式、组织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不仅直接推动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为世界出版事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对中国出版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梳理中国出版事业的源流、演变及其发展脉络，对于探索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规律，展示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促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

与中国出版实践活动的悠久历史相比，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其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19世纪末至1949年）、曲折发展阶段（1950—1979年）、繁荣阶段（1980—）。前50年多为考据之作，资料搜集虽丰，但理论阐述不足，其成果只能称之为史料集，上升不到发展史；中间30年呈不均衡发展状态，前期稳步成长，后期萧条

冷寂，内地停滞不前之时，港台有所收获进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繁荣阶段，高潮迭起，佳作频出，中国学术界推出多部有分量的力作，国际上出版印刷史研究也日趋活跃。

在19世纪以前，一些关于图书印刷、校勘、贸易活动的记载，多散见于各家笔记、文集，专门论述出版历史的著作尚未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研究藏书、刻书的滥觞之作有两部：一是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1897年），二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1911年）。此后的中国图书出版史和印刷史研究者，大都遵循这两部书的研究范围和基本思路，不断突破和创新。20世纪20年代前后，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1918年），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两浙古刊本考》、《五代两宋监本考》，叶长青的《闽本考》，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向达的《唐代刊书考》（1928年）等一批论著，分别就出版事业的某一时段、某一地区、某一形制或某一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证。这些著述书证详明，立论谨严，学术性大为增强。缺点是不够全面系统，甚至没有明确提出出版史的概念。1925年，美国学者卡特发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文，开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出版史之先河。1946年8月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杨寿清著《中国出版界简史》，应算作我国最早正式以“中国出版史”命名的专著，但其内容比较简略，全书仅不到5万字。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版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取得喜人的成就。张静庐历时近20年苦心发掘、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本《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有关出版的重要资料，其中包括大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为出版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张

秀民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在广泛收集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史研究成果。这一阶段，海外学者的出版史研究亦颇可观。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名誉教授钱存训《书于竹帛》(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一书于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而填补了两方面的空白：一是印刷术发明以前的出版史；二是以海外学者用英文写作，传播中国古代文明及其对世界文化史的贡献。

总体而言，这30年的出版史研究工作虽有发展，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完整系统的中国出版史学科体系尚未建立。

从1980年起至今，出版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研究范围不断开拓，诸多空白得到填补；2. 研究方法多有创新，内容体例各有所长；3. 研究成果形式多样，提供多处发表阵地；4. 研究层次不断加深，纠正不少谬误成说；5. 研究目的日益明确，探讨规律继承传统；6. 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海外学者投身其中。

取得上述进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党和政府的重视，相关部门加强了对出版史料收集工作的组织和引导，使研究工作进展较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出版局(1987年更名为新闻出版署)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全国有26个省市的新闻出版局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出版史料征集工作网络，制订了《征集规划》，拟订了征集选题，征集和整

理了一批资料，完成了一批编写任务。浙江、河北、江苏、广东、北京、山西、陕西等地编辑出版了一批专题史料；湖北、上海、山西、山东等地还组织力量编写出版史志，形成了系列成果，如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北京出版史志》等等；一些出版机构也参与到出版史料的征集编辑工作中，如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华书店总店等机构的店史、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此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上海新闻出版局编辑出版的季刊《出版史料》以及继之而起的开明书店编辑出版的季刊《出版史料》，作为出版史研究的专业期刊，始终发挥其信息量大、传播快捷的媒体优势，发掘并公布了一大批近现代出版家、出版物以及出版机构等方面的最新资料，为出版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多年来，有一批热心的老出版人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积极参与出版史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如北京的戴文葆的历代编辑家研究、叶再生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汪家熔的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方厚枢的中国当代出版史研究，等等，都有独到见解和突出贡献。上海的宋原放、吉少甫还撰写有中国出版史的通史性著作。

再次，高等院校集中了一批出版史研究力量，如北京大学的刘国钧、郑如斯、肖东发、王余光，武汉大学的谢灼华、曹之，南开大学的来新夏，复旦大学的姚福申，河南大学的宋应离，等等，很早就开始研究书史、出版史、印刷史。1985年以来，许多高校相继开办编辑出版专业及图书发行专业，推动了作为该专业核心基础课程的出版史教材的编写，许多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即是在教材基础上逐步完善成形的。

此外，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文史馆等文化单位以及新闻单位、历史研究部门的史学工作者，如国家

图书馆卓有成就的张秀民、李致忠，中国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潘吉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史金波等，也涉足出版史，从而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出版学术机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出版史研究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的领军作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相继推出《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等三部论文集，还编辑出版了《出版史研究》辑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致力于出版史资料的积累和学术交流的推动，为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在出版史领域，港台和海外学术界亦积极参与，并涌现了一批知名学者和重要成果，如钱存训、李书华、屈万里、昌彼得、吴哲夫、潘美月等，不仅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出版史研究领域颇多建树，而且培养了一批不同国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出版史研究输送了新军。近20余年来，在海外召开的有关中国出版印刷史的学术研讨会，也反映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出版史的热情与成就。如1988年在美国圣迭戈召开的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专门设立以“纸和印刷”为主题的分会。1998年在美国俄勒冈、2000年在纽约举办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图书展览及在圣迭戈亚洲研究学会年会期间，均举办了关于中国印刷史专题的学术会议和专题研讨。在韩国，1997、1999、2000年连续召开中、日、韩、德等国学者参加的有关金属活字及印刷图书文化起源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交流活动表明，中国出版印刷史的研究不仅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而且也得到国际上热心中国文化

史研究的学者们的关注。

综上所述，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总体上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合力，有分量的出版史研究著作不多，全面系统的通史性专著尚未出现。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本书力图汇集前人研究成果，推陈出新，填补这一出版史研究的空白。既反映新时代的特色和水平，注意充分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有所发展，有自己的观点；既避免“以论代史”空洞无物，又防止“以史代论”堆砌史料，做到“史论结合”；既防止以偏概全，在没有掌握主要史料的情况下即做结论，又防止面面俱到，主次不分。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同时，努力做到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观点正确。

二、出版的概念与出版的起源

什么叫做出版？这是研究出版学、出版史首先要接触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本书首先要明确的重要概念。

“出版”一词在中国出现较晚，大约于19世纪初期开始使用。在现代汉语中，“出版”一词属于外来词，与国外关于出版的涵义相差不大。按《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出版”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物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1971年修订的《世界版权公约》中规定，“出版”为“可供阅读或视觉可以感知的著作以有形的形式复制并向公众普遍发行的行为”。

以上各种定义，虽然在字面上稍有差异，但对出版活动的本质和基本要素的认识却比较接近。总之，“出版”的概念应该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要素：（1）有反映人类文化知识和

思想、情感的作品；(2) 进行一定的编创工作；(3) 运用复制技术，将作品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之上；(4) 通过发行出售或者其他办法进行传播。简言之，所谓“出版”，就是将知识、思想或其他信息产品经过加工以后，以手抄、印刷或其他方式复制在一定物质载体上，并通过出售或其他途径向公众传播的活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完整的出版活动应该包括编著作品、加工复制、广泛传播三方面的内容，这三方面的内容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从本质上讲，出版具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文化知识的传播功能，一是文化知识的积累功能。

关于出版的起源，是出版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有先秦说、汉代说、隋唐说三种。众所周知，出版活动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阶段，是从一种朦胧的、原始的、范围与作用有限的活动形态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系统的、范围与作用日渐可观的活动形态的过程。萌芽时期的出版活动是粗糙的、散乱的，原始的出版活动与现代出版活动注定在外在形式与工作流程上多不相同。但在本质上，它们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技术、范围、载体、作用的差异虽然存在，但是不会导致出版活动本质的变化——它们都是人类精神成果的编辑、物化与传播过程。

出版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产生需要一定的物质与文化条件。大致说来，出版的产生应具备下列条件：

其一是文字产生并相对稳定，有记录的需要。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道：“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古，后人所以识古。”系统的、稳定的文字的产生是出版产生的最基本条件之一，稳定的文字使得知识的传播

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得出版的文化保存与传播功能得以实现，而记录的需要则是出版活动产生的重要内在推动力。

其二是有整治并保存文化载体的技术。文字必须附着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才可以流传并发挥作用，精神成果的物化离不开整治载体的必需技术，这是最基本的技术要求。

其三是有相对成熟的复制技术。

其四是有初步的编辑行为。不经编辑加工的文字材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物，出版活动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编辑活动的出现与早期编辑标准的形成。

其五是有保存或传播的愿望。保存或传播文化成果的愿望是推动出版产生的内在动力，出版行为在精神层面上实际上源自这种愿望。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出版活动应该从有简牍和帛书的先秦时代说起。

出版起源之时比之于出版成熟之际主要有以下区别：

1. 出版活动集中程度不同。出版起源之时，出版的各个环节之间是一种松散的联系，专业出版机构还没有出现，一次完整的出版活动所需要的时间比较漫长。出版活动成熟时，各个环节的联系紧密，系统性增强，专门的出版机构与出版人员出现，各项生产要素集中，效率不断提高。

2. 出版活动的性质不同。出版活动产生之初，主要是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存在的，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贵族阶层对文化的垄断，出版活动中的经济色彩淡薄。出版成熟以后，图书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商品属性成为经济社会出版活动的属性之一。

3. 受众范围与社会作用不同。由于文化的垄断、传播技术的落后，萌芽时期的出版活动面向的主要是贵族子弟。随